

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战略

菱田 雅晴
(法政大学教授)

◎ 原文刊载于「日」『中国共産党のサバイバル戦略』三和書籍、2012年

◎ 袁广泉 译

一、为何必须研究“党”？

当我们研究转型期中国各种政治社会现象时，即使制度层面的实际形态探究得相当明瞭，也总有一个残余项无法深入。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权力。

比如富裕的“中间阶层”兴起这一现象。这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新变化的象征。所谓中间阶层 (middle class) 问题，是李普塞特 (Lipset Seymour Martin) 提出的命题，即随着经济发展而收入提高，于是出现富裕的中间阶层；由于他们政治意识的增强，现行政治体制将从内部发生变革。因此，中间阶层被视为承担经济增长“溶化”威权主义体制的社会力量。经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实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成长，所谓“中间阶层”在中国能成长到何种程度？他们能否成为变革中国管理构造的“承担者”？抑或仅是出于政策意图、作为“体制培育出的阶层”而发挥维护体制作用的保守的“缓冲器”？

要较好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从中间阶层本身与现有政治体制的核心势力——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寻找答案。亦即，中间阶层的私营企业主、城市白领是否属于该政治组织的一部分？他们作为党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自觉与作为中间阶层的阶层意识是怎样的关系？中间阶层为得到现有中间阶层的地位，与党和国家的政策及制度形成了怎样的关系？他们怎样认识这种关系？他们是把改革开放政策看作“恩惠”而“感恩戴德”？还是仅将其当作经商条件一环而加以利用？党对中间阶层的态度到底如何？

再比如被称为中国式“民主实验”的村民自治。随着19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推广，曾经的集体经营被家庭经营所取代，原有乡镇政府随之复活，¹⁴“广西等自然出现”了农民自治组织，¹⁵此即村民自治之发端。有鉴于此，1982年宪法规定由农村居民成立自治组织¹⁶，其后，村民委员会一直实行“民主”选举。由该基层选举制度所实行的“民主实验”，自1987年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后，中经十年“试行”期，1998年正式通过，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¹⁷投票方式采竞争性“差额”、无记名投票为原则。较之从前仅对指定候选人投票表示支持或不支持的“等额”信任选举，选民的选择余地增大，选举制度有所改善，变得更加“民主”，此点意义重大。而且，村民自治这一基层政治的“民主”选举潜在

¹⁴《关于政社分开和成立乡政府的通知》（中共中央，1983年10月）规定，要分解“政社合一”体制，成立乡政府，同时成立乡党委员会，根据群众需要成立经济组织；乡的规模以原人民公社管理范围为基础，1984年底前成立乡政府。

¹⁵民政部：《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制度》，1993年12月。

¹⁶1982年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

¹⁷1987年11月24日，第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6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经十年试行期，1998年10月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的影响让人产生如下期待：纵向地，有可能超越自治而发展成乡长、镇长乃至县长等行政首长的直选甚至公选；横向地，则可能影响到宪法上有同样规定的居民委员会主任的选举，并由此再纵向发展成市长直选、公选。极而言之，地方选举的民主改革，与经过“中华民国台湾化”过程⁵⁴于1996年最终走向总统直选的“台湾经验”不无相通之处。

那么，这种村民自治的村长选举经验，能否成为中国民主化过程的起点？能否像台湾总统直选那样，将来演变成国家主席直选？抑或仅对加强党的统治有所助益？

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村这一自治单位的真正首长到底是谁。亦即，村长到底是以有选举权的全体村民为选举母体、依“民主”程序选出的村民委员会主任，还是按上级指示仅由村内党员推定的村党支部书记？这种事态是由村这个农村社区同时存在两种政治势力而派生出来的，一种势力是全国性金字塔形组织的末端机构，另一种则是基层自治这一与之呈抗衡关系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势力。换言之，我们无论怎样调查、分析候选人选定和投票及开票过程等实际情形，最后难以触及到的是“两委关系”，即村民委员会主任与党支部书记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

党和国家为何试行这种含有“自下而上的民主”冲击力的“民主实验”？是期待以这种方式释放农村内部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还是迫于海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判而摸索中国式民主，并以此作为“无罪伪装”？是试图通过选举这一制度化洗礼来加强党对农村已明显松弛的管制能力？还是当局内部“隐蔽”开明派推动的真正民主化努力之一环？

通过如上简单设问可知，为现代中国研究的各种课题提供答案的避不开的最终命题是，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新要素即中间阶层的私营企业主、城市白领及村民委员会主任，与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权力到底处于怎样的关系，或者他们希望与党结成怎样的关系？反言之，党又希望与他们结成怎样的关系？

不仅政治社会现象，经济领域也存在几乎同样性质的问题。因为，尽管市场化取得迅速进展，党的权力却依然强有力地控制着资源要素分配的过程。作为经济改革的直接成果，中国经济的确正在迅速实现市场化或“资本主义”化，但如当下“国进民退”现象所示，中国经济的成功却并非各市场因素通过完美的自律性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因为，尽管市场化、分权化不断渗透、深化，但中国共产党仍作为“万能神”而高居于所有领域的顶端。

二、“党”到底是什么？

反过来说，对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政治核心，我们又了解多少？对这个巨大政治组织，我们真地掌握了充分的知识吗？实际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的确，中国研究作为区域研究之一，自1960年代以来，党史研究领域已积累不少成果。⁵⁵在此基础上，许多中国政治学者面对这个巨大政治权力，分别就自己关心的课题——从权力构造论、政策决定论或中央与地方关系论到党的干部管理制度、档案制度、与全国人大的职能分担等——进行着艰苦搏斗。⁵⁶

⁵⁴详细论述请参阅若林正文著《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

⁵⁵在中国共产党史研究领域，日本老一辈学者如东京大学卫藤沈吉名誉教授、庆应义塾大学石川忠雄、山田辰夫两位名誉教授等都有丰富的研究业绩。

⁵⁶有关党在中国政治中地位，代表性学者及其成果有唐亮著《变容する中国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加茂具树《現代中国政治と人民代表大会》（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谏访一幸：《中国共産党の幹部管理政策——『党政幹部』と非共産党組織》（亚洲政

然而，当我们现在试图把这个政治权力作为“组织”来把握时，比如有关该权力组织的成员规模，我们甚至连历年党员总数的变化都无从跟踪了解，只能拾取散逸于各种研究文献的零星资料，或依据近年党中央组织部发表的笼统性资料。结果，至少在编制历年党员人数变化统计表时，不得不留下大量空白。

再比如，该政党组织保有多少资产？该政治组织成员在进行各种活动时，其预算规模有多大？组织的最根本性经济来源即党员所交纳的党费规模如何？在组织活动预算总额中，党费及其他自有财源各占多大比重？其与财政部管理的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国家年收支的关系到底如何？国家预算是否对该政党组织提供若干事业补助？从党即国家这一国家统治特质考虑，党无疑处于优越地位，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党在资产、经费预算方面也具有特殊优越地位？

也就是说，在我们试图将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权力视作政党组织时，我们甚至并不掌握其党员规模、预算结构等评估组织的最低限度资料。本来，在中国，某集团要取得合法地位，须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为社会团体，并须接受主管部门等的认可和监督。但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最大规模的组织，恐怕连这个法律制度的规定也无需遵守。⁸⁴这源自该组织的历史。该组织自1921年建党至1949年掌握政权，曾经过革命政党、反抗势力、地下势力等阶段，保守秘密因此成为其传统。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又是党与国家密不可分的“党国体制 (Party-State system)”。

总之，日本学术研究领域的现状是，尽管上述个人研究付出巨大努力，但直接以中国共产党本身为对象的研究项目，至少近年来处于停滞状态。国外情况也大同小异。柏思德 (Kjeld Erik Brodsgaard)、郑永年曾通过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召开国际研讨会等，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权力结构。同属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 (David L. Shambaugh) 和狄忠蒲 (Bruce J. Dickson) 也分别出版过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研究著作。新闻界人士则有英国的马利德 (Richard McGregor) 著有《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但是，在有关中国的著作中，上述著作毕竟还太少。

因此，为在实践层面上准确把握近年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的现代中国的动向，同时为在学术领域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演变过程中的现实状态构建新的政治社会发展理论，整合原有个人研究，从所有角度和侧面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存在重新作综合研究，应属目前当务之急。亦即，在推动此前各类个人研究成果继续深化的同时，应努力描绘出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权力的“断面图”。

三、中南海研究

鉴于上述背景和认识，作为科学研究经费基础研究 (A) 项目，我们以现代中国政治最重

治学会编《アジア研究》，第50卷第2号，2004年）、諏访一幸：《胡锦涛時代の幹部管理制度——『人材』概念の導入から見た共産党指導体制の変容可能性》（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國際政治》，第145号，2006年）等。而以中国共产党本身为对象的研究，菱田雅晴、园田茂人著《經濟発展と社会変動》（シリーズ現代中国経済、第8卷，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年）以及毛里和子著《新版 現代中国政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都曾探讨过党的变化。但应当说，这些探讨在整个学术界尚非主流。

⁸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50号，1998年10月25日公布施行）第3条规定，“下列团体不属于本条例规定登记的范围：（1）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2）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3）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

要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为中心主题，于 2007 年组织了研究组，命名为“中南海研究”，试图以政治社会学的实证分析手法，对该政治组织从权力结构、组织制度乃至社会表现作综合性、实证性把握，重新审视中国政治的出发点。而这项研究之一环，就是由本书各文执笔者等十数名成员组成的“中南海研究会”，自 2007 年每月所进行的共同研究活动。

毋庸赘言，受市场化改革政策深化的影响，因所处外部环境发生巨变，以及党员属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正经受着变革压力。虽然宪法依然明确规定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但意识形态环境已经变化自不待言，更因实质上的组织基础即党的细胞组织急剧减少，党员的个人身份趋向高收入、高学历等，工人、农民事实上似逐渐遭到排挤清除。面对这种情况，党本身也已发生巨大变化，甚至通过了“三个代表”理论，以接纳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家”阶级私营企业主的加入。^①

中南海研究会最主要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实证性方法把握共产党的这些变化。我们首先探讨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否将从原来的阶级政党走上“全民党 (catch all party)”道路？还是将强化其代表“改革开放竞争”胜出者阶层利益的精英阶级政党色彩？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探究不同趋向和前景将对对中国政治产生怎样的冲击。本书即中南海研究会研究活动中间成果报告之一部分。

有关现代中国政治变动各种趋向的可能性，已有学者从近代化论、民主化论或市民社会论、社会发展论等角度，带着预感或期待提出过各种预测。这些预测对中国政治体制演变的结局所作展望，大体可分三类，即①向民主化演变，②走向崩溃、混乱，③逐渐适应。

关于①向民主化演变，学者们对其进程有各种看法。有学者曾就实现民主化的具体时期做出预测，如胡少华的 2011 年说^②、亨利·罗文的 2020 年说^③、英格尔哈特的 2025 年说^④等；还有学者则指出体制转换“早晚 (soon or later)”会实现，却未预测转换时期，如吉莱^⑤、戴蒙德^⑥等。这些预测的共通之处是，都认为中国以某种方式演变为“民主”体制是必经之路。不过，此类观点，归根结底，只不过把多义的“民主”概念当作理当无条件追求的普世理念套用于中国，以表明论者的期待而已——尽管并非所有论者都如此。

相反，②走向崩溃、混乱的预测，其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某种“转换”的结局，不如说是其过程。其中又分作两种判断，魏昂德 (Andrew Walder)、裴敏欣等关注的是“政治麻痹 (political paralysis)”、“国家能力磨损 (erosion of state capacity)”^⑦等管理“危机”，而章家敦等关注的是“衰败与分裂 (decay and disunity)”^⑧等管理本身的“崩溃”。尤其是后者的中国崩溃论，往往也是上述基于意识形态的民主化期盼论的主倡者。

而处于二者之间的③逐渐适应论则认为，尽管存在尽人皆知的管理“危机”，但实际上中国政治正在采取各种对策以应对环境变化，而且正不断取得成功。这无疑是对上述两种观点

^①请参阅菱田雅晴：《中国共产党のメタモルフォシオ》，收于寺岛实郎等编《大中華圏の実像——連携のための模索》，岩波书店，2004 年。

^②Hu, Shaohua. [2000]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Praeger.

^③Rowen, Henry S. [1996] "The Short March: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Nixon Center.

^④Inglehart, Ronald (co-authored with Christian Welzel) [2005]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⑤Gilley, Bruce [2005]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⑥Diamond, Larry Jay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⑦Pei, Minxin [1998] "Is China Democratizing?" *Foreign Affairs* 77: 68-83.

^⑧Chang, Gordon G. [2001]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Random House.

的否定，但学者关注重点各不相同。如沈大伟提出“衰微与适应 (atrophy and adaptation)”的观点，¹⁸狄忠蒲指出“怀柔 (embrace)”的特点，¹⁸李磊 (Pierre F. Landry) 则指出通过分权措施对政治精英的成功掌控，¹⁹景跃进等则注意到党“组织技术”的特点如转型、吸收、渗透等。²⁰

上述各种观察和预测直如“百家争鸣”，而导致其内容或异或同的核心要素，则在于如何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形态。而这也正是中南海研究的意义所在。

四、黄昏 (Dusk) ? 还是黎明 (Dawn) ?

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否因 19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内外巨变而深陷危机，从而面临 1949 年建国后执政六十余年来最严峻的生死存亡考验？抑或这个世界最大政党、中国最大规模的利害集团，反而抓住变化时机正在重新夯实其存在基础、铸造更强有力的存在依据？若将各种观点分作“黄昏 (Dusk)”论、“黎明 (Dawn)”论两类，并按构造、目标及成员等组织论的分析要素，从变化形态对其加以探讨，则两类观点共同认识到的是如下事实：党作为组织已发生变化，曾经支撑该组织的内部向心力和外部支持，已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再有效而迅速磨损。对如此事态贴上“危机”标签的即“黄昏”论。“黄昏”论者断定，磁力递减且失去了磁力赖以发挥作用的磁场、内部已容纳许多异己分子的组织，除崩溃外无路可走。相反，“黎明”论者则把组织目标的修正、党员结构向改革开放的“胜者联盟”——即高收入、高学历阶层——倾斜而得到改善等，视为切合现实的应对策略，并赞赏其因此得以脱却旧意识形态制约，同时提高了针对现实作出灵活反应的能力。比较上一节所述预测分类，则“黄昏”论实则为①、②两种预测的根据，而“黎明”论则近于与③。

让我们对“黄昏”论和“黎明”论作一概观。首先，二者皆看到党作为组织已与昔日不同。曾经支撑该组织的内部向心力和外部支持已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再有效而都已遭到严重侵蚀 (erode)。对于这种事态，“黄昏”论投射的光束是“危机”，并得出如下结论，即磁力递减且已失去磁力赖以发挥作用的磁场、内部已容纳许多异己分子的组织只有走向崩溃。在“黄昏”论者看来，投射“适应”光束的“黎明”论所赞赏的面对现实就组织目标所作的灵活反应和调整，不过是把明确“目的”“下调”为单纯“理想”，并由此看到组织本身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黄昏”论还认为，党员结构向改革开放的“胜者联盟”大幅倾斜，正标志着该组织的质变和危机已达极限状态。

“黎明”论作出上述判断的原因，可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到目前为止所作的灵活反应一本书称之为“预防性生存战略”。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党的应对一直积极主动，既没有懵懵懂懂地被卷进“危机”，也未曾张皇失措地寻求补救，而是主动、慎重、积极、果断地引导

¹⁸Shambaugh, David L.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¹⁸Dickson, Bruce J. [2008]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¹⁹Landry, Pierre F. [2008]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²⁰景跃进：《转型·吸收·浸透——党的组织技术的变迁与课题》，本书，第 4 章。

²¹关于该问题，请参阅菱田雅晴：《中国共产党——危機の深刻化か、基盤の再铸造か？》，收于毛里和子、园田茂任编《中国問題 キーワードで読み解く》，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 年 9 月。

和驾驭着改革开放后的演变过程。正因其积极主动，才能通过“怀柔”、“接纳”方式把潜在反对势力封杀于萌芽状态。现实的反对势力即“抗议者”本身也显然是现行体制的一部分，而决非从外部抵制现行体制的“挑战者”。当下，标榜“学习型政党”的该组织的预见性极具战略眼光，而且在现阶段似乎行之有效。

五、何谓“生存战略”？

关于何以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性应对举措，可指出如下几点背景原因。第一，最须强调的是，党本身在上述演变即“组织危机”问题上，一直是积极而主动的应对者。如前所述，党并非被突然卷进“危机”，现时也没有为寻求补救而忧苦呻吟，而是一直积极主导、驾驭着这一过程。中国本身主张的不经政治变动而实现经济发展的模式“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就是这种积极、主动态度的典型反映。²²此外，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防止“抗议者”扩张势力也极富成效，不容忽视。总之，党积极、主动应变，对潜在反对势力采取怀柔、容纳态度，同时积极谋求自身变革，这都是极富远见的战略性举措。

近年，中国共产党引进资源依赖性经营战略理论的引领者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的“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 LO）”概念，自称“学习型政党”（本书第二章），这是又一战略性变革。所谓“学习型组织”，即组织要求其成员主动学习，学习成果则由整个组织共享，以此提高组织的竞争能力，是与此前的威权主义组织（管理型组织）相对的组织模式之一。“管理型组织”旨在追求“效率”，而学习型组织则以发现和解决问题为目的，要求成员把握顾客需求等状况，并为发现和解决问题而持续不断地学习。这被认为是运用“学习型组织”的概念和手法由基层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可视作党通过“三个代表论”后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不妨认为，至目前为止，这种极其大胆的“预防性生存战略（preventive survival strategy）”已经获得极大成功。

之所以作出如此判断，是因为反对势力即潜在“抗议者”本身显然是现行体制的一部分，而决非从外部抵制现行体制的“挑战者”。政治改革往往伴随着意识多元化而引发政治价值理想出现分歧，但至少在当下，政治价值并未出现较大分歧。可能是最大潜在威胁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价值意识，看上去与当地机关干部的价值意识几乎没有不同。²³

通过这些措施逐渐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应变方针，就是“党的生存战略”。就该策略的不同侧面，本书各章分别就观察结果进行了分析。此处仅就关键内容作一概观，以呈现本书的基本立场（表序-1）。

表序-1 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战略

		应对危机与管理危机的整合（Crisis management+Risk management）
特	预防性	预先大胆而细致地准备预测、预防、应对危机的预案，排除“意外”事态。
	集体性	不依靠个人建议、而以集体经验为根据的集体经验智慧。
性	快速反应性	注重应对具体事态的方针，而非有形的具体战略。
	积极性	迅速制定并强有力执行行动计划。

²²菱田雅晴：《中国：“全球化”の寵児？》，铃木佑司等编《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グローバル・ガバナンス》，法政大学出版社，2009年。

²³前引 Dickson, Bruce J. [2008]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两义性	软硬两类手法同时并用。
内 容	变革：改变与进化 (Metamorphosis+Morphogenesis)	
	组织目标	重新制定目标 (党章)。
	组织规定	重新确立自我形象 (“三个代表”)。
	组织技术	变化、适应、渗透、吸收。
	层 化	使危机止于当下层面，最大限度防止其向高层级及其他阶层扩散，以实现低成本危机管理 (降低严重程度[severity])。
	战术手段	IT 工具 (e-CCP)。

首先，形成党的生存战略的第一要素，是应对危机 (crisis management) 与管理危机 (risk management) 的成功整合。亦即如下预先及事后危机管理手法：一旦发生危机，首先充分运用应对手段控制其冲击，同时将发生具体危机事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尤其显著的是其预防性，即提前就危机的预测、预防、发生后的应对方法制定大胆、周密的预案，以排除“意外”事态发生的可能性。而且，这不是特定领导人个人的提议，不是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论、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那样冠以特定领导人名称的政策方针，而是在共产党这一共同背景下基于集体经验而形成的智慧。而且，这种策略与其说是有形的具体战略，不如说是集应对具体危机方针之大成。因此，快速反应能力才是该策略最重要的武器。但支撑这一策略并使之有效的，则是组织内部全体成员共同的“党的危机即自身危机”这一强烈危机意识，和组织外部“党以外无从选择”这一占据绝对优势的共识。怎样才能使这个中国规模最大的利害集团、唯一的政治组织继续存在下去？正是这个目的才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现象变成了“没有党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明天”的信念，并为人们广泛接受。

这些预防性、集体性、快速反应性，反映了生存战略的整体特性，即迅速制定和强有力执行行动计划的能力。这个特性，可说与有名的军事战略论“包以德循环 (OODA Loop)”完全一致。所谓“包以德循环”，是美国空军上校包以德 (John Boyd) 提出的决策理论，强调通过反复进行观察 (observe)、调整 (orient)、决策 (decide)、行动 (act) 而实现有效决策。²²中国共产党制定其生存战略，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该理论，不得而知，但无疑与该循环完全相符。亦即，对于中国内部所有领域发生的事态，通过覆盖全国的金字塔形组织予以把握，整合各层级的形势判断，再由党中央作出决策，并通过强大的组织力量化作各层级的具体行动。考虑到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内战及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军事革命组织，其军事战略理论色彩甚浓的生存战略，不妨视作包以德循环的翻版。

观诸该生存战略的具体构成要素，首先是组织目标的重新设定。所谓组织，乃为实现某一目标而成立，故目标如何是组织的本源性决定要素。因为，个人加入某一组织的前提，是对该组织所追求的价值、理念、理想等目的产生共鸣，并愿意与之采取一致行动；而组织的各种活动，如在内部建立各种制度、规定，设置各类机构等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建党以来，曾十七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进行修改；建国以后，至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已十次修改党章。在此过程中，“实现共产主义”被不断“下调”——从“最终目的”变为“目的”，再变为“最终目标”，2002 年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被改为“最高

²²据称，包以德循环源自对朝鲜战争时美军 F-86 和苏联、中国的 MiG-15 战斗机空战经验的总结。包以德曾亲自驾驶 F-86 与 MiG-15 交战，并基于经验得出结论称，决定胜败的根本要素是操纵战机的反应时间和驾驶员在驾驶室视野影响下的决策速度。Osinga, Frans P. [2006] *Science Strategy and War: The Strategic Theory of John Boyd*, Abingdon. UK: Routledge.

理想”。应该说，这是共产党组织强韧、足以适应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可能性这一外部环境巨变的标志。²⁵

共产党生存战略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其对组织进行管理、运作的组织技术，以“适应、渗透、吸收”为特点的大胆的组织变革。通过本书第四章景跃进论文的生动描述可知，这是一种直面环境变化、容纳和吸收歧见分子，同时积极而大胆地面对新环境的组织手法。

就战术而言，层化手法是其特点，即一旦危机发生，则设法将其影响控制在当下层面，最大限度防止其向高层级及其他层级扩散，以实现低成本危机管理。通过危机“局部化”来缓解和降低对整个组织的冲击程度（severity），这可以说是危机管理第一步的真谛所在。的确，中国各地频发“抗议”现象或“群体性突发事件”，但“事件”本身都被作为地方性个案而“局部化”，对组织整体的冲击十分有限。²⁶俚语有“中央干部是恩人，省级干部是亲人，县级干部是恶人，乡镇干部是坏人”，表明危机根源主要在乡镇或村级干部，越往上，人们对其越是信赖，对党中央、国务院的信赖则高达90%以上。²⁷

战术上的最大特点，是看似相互矛盾的软硬两类手法同时并用。IT工具的应用即其例证。在关注振兴IT领域对发展经济重要性的世界各国中，中国属先进行列，构筑IT信息社会，自始就是在国家主导下进行的。1998年，国务院就设了信息产业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以整合原由邮电部、电子工业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航天工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主管的信息、网络管理业务，制定信息产业领域和信息通信相关政策。2008年，信息产业部又整合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的部分部门，发展成现在的工业和信息化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1993年，中国政府制定了旨在实现金融等部门的信息化和电子政府化的国家信息战略，称之为“金字工程”，利用IT推动电子政府化的水平比日本还要先进。此前掩蔽在“竹幕”后面的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开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所提供信息之丰富，远超许多人预想，其行动之快，甚至给人以“网络化中国共产党”（Cyber CCP）之感。

另一方面，“金字工程”还包括旨在实现公安部门信息管理系统化的“金盾工程”。1998年9月，国家公安部制定金盾计划，并于2001年4月通过国务院批准。“金盾工程”现已成为中国政府屏蔽有害网页、管理个人信息、监视浏览信息等的强有力工具。IT技术被称为双刃剑，而中国在将其作为产业政策重点积极推进的同时，又实施彻底监管网络空间的强硬路线。2011年秋召开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试图将文化产业培养成支柱产业的决定，也十分重视强化包括网络在内的社会管理。这一系列政策，与充分预见到信息革命的重要性和危险性的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战略”十分相似。

六、本书结构与内容

本书将聚焦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并以上述“生存战略”为核心作全面解读。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将以中国政治整体为背景重新把握共产党。第二部分则关注制度方面，探讨党的组织结构与经济、人事等各种组织制度。第三部分则基于中南海研究会所作微观调查，

²⁵前引菱田雅晴：《中国共产党——危機の深刻化か、基盤の再鑄造か？》。

²⁶菱田雅晴：《不安定下の安定——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の現況》，《東亜》，2012年1月号。

²⁷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中国社会稳定网，西南政法大学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2010年10月9日（原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尽量贴近现实社会中党及党员的形象。下面简要概括各章，以方便读者阅读。

【第一章 基于数据解析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毛里和子）本文试图以量化手法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公开发表的有关党的数据极少，且发表时已经筛选。毛里首先指出中国政治数据的贫乏和问题，并对这些数据充分探究，基于党员的年龄、职业结构等尽量公正地描绘中国共产党的客观形象。通过该文描述，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正在变为高学历精英集团，党的精英化在江泽民执政的1990年代后半期以后进展尤其迅速，较之一般社会，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其最上层一手掌握了财富、权力和威望。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社会向资本家、中间阶层和工人农民三个阶层分化，毛里提出一个问题，即共产党能把该三阶层系留在同一政治组织到什么时候？并预测，一旦这种状态被打破，共产党本身的结构及其政治功能也可能被彻底改变，党内将发生派系分化并得到承认，党将因而发生分化，从而向多党制转化。

【第二章 党中央研究机关——“学习型政党”建设与“调研”工作】（朱建荣）该文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生存战略的构成要素之一，即其灵活性。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灵活性一面对不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局面，就其背景、根源及核心、本质进行彻底调查研究，并依据结论迅速制定相应对策，然后通过“试点”积累经验，迅速转换和实施新的政策和对策，同时对新出现问题迅速进行修正和微调——是中国得以克服许多困难局面并成功实现自我改革和经济跃进的关键要素。基于这种认识，朱文描绘了“调研即调查研究和反馈的过程，分析了党以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为目标，以不断谋求自我改革这一中心任务。该章对中国的权力中枢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直属机关和部门的学习和调研的动向作了细致梳理和精确把握，阐明了党解决新问题的机制及其内部应用系统的实际状态。在此前提下，鉴于中央领导层的努力和愿望与国民层次的实际效果并不一致，朱得出结论称，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以反映时代潮流和国民心声、谋求弃旧图新，依然任重道远。

【第三章 中国的国家管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与能力】（高原明生）该章基于管理论立场，从三个层次——高层（macro level）的决策过程、中层（mesoscopic level）的统治能力和基层（micro level）——对中国政治管理作了探讨。关于高层管理，该文探讨了中央的决策过程和党与国家的关系，指出通过在人事配置方面党和国家重要职位兼任以及设立党组、议事机构等组织，党对国家的领导在中央层级上已确立贯彻执行系统，因而在中央层级上，党和政府在决定重要政策过程中已有比较成熟的协作机制。而对中层管理即地方党委的执政能力，作者认为较之理想状态尚有很大改善余地。关于以城市社区自治为对象的基层管理，作者指出在中国社会基层，党的领导与自治处于共生关系。作者的结论是，一党统治不受任何权力制约的内在缺陷，是位于中国管理中心位置的共产党改善其管理的根本阻碍因素；而党的执政能力若得不到强化，实际问题又难得解决，处于这种两难境地，则共产党的统治能力有可能走向衰落。

【第四章 转型、吸收、渗透——党的组织技术的变化与难题】（景跃进）该文就本书的核心课题即党的组织技术变化这一生存战略的最大特性进行了仔细梳理，是本书最精彩部分之一。该文出发点是，党主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各种“挑战”；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将其转化为继续改革的动力和革新制度的资源，对党和国家体制存亡意义重大。该文尖锐指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上面临三个挑战，即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民主”选举、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变和市民社会的成长；而在应对这三个挑战时，中国共产党分别采用三种不同的组织技术，即“转型”、“吸收”和“渗透”。在详细探讨后，该文认为，中国共产党依然是列宁主义政党，党和国家体制的基本架构和性质没有根本性变化，因而期待其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变化是不现实的。那么，党和国家体制是否会发展为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新型民主模式？对此，作者谨慎表示，因还在变化过程

中，尚需不断探讨和验证。

通过上述四篇文章，读者将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有所认识。而下述第二部分则对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现今所依据的各种制度背景进行探究。

【第五章 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管理与中国共产党】（加藤弘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形成带有激励机制（incentive mechanism）的经济体系，而这个体系支撑着高度增长。基于这种观察，该文以地方政府和党的管理状况为焦点对该机制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加藤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体系的特征是，政府权限极其强大，同时各地竞争十分激烈，而政府对市场的介入是作为上述看似相互矛盾倾向的维系，在不过分损害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的。在此基础上，该文指出，地方政府实施管理时表现出的中国特有的激励机制是改革开放后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要素，这种管理的背后则是“一把手”体制下重视经济指标的干部评价和选拔体系。该文认为，面对转换领导理念这一课题，共产党通过恰当应对和持续高增长维持了统治正当性；但今后的问题在于，共产党政府能否通过转换政策目标而确立对地方政府的管控，能否确立政府内部激励机制和基于该机制构筑干部评价和选拔体系。该文还论及无锡市率先实施、后来为云南、贵州、河南、河北等省效仿的“河长制”；而该制度能否成为转型期政府管理行为恰当方向的标志，的确值得关注。

【第六章 农村基层组织改革的进展与党支部—经济发展和组织多样化】（大岛一二）该文主要分析农村社会中共产党的作用，在把握中国农村重要的基层组织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机能及其近年改革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与这些组织形成表里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支部组织的现状，尤其基于在当地的调查结果，详细探讨了近年不断壮大的农村私营部门（私营企业、个人企业等）及正在兴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共产党支部组织的关系。该文专论党的生存战略尤其是其“渗透”手法在农村社会的现状；不过，作者所关注的是，随着原有农村基层组织作用减弱，农村党支部在农村的地位是逐渐在萎缩，还是在以某种方式扩大其对新生的、力量不断增强的各组织的影响，从而维持和扩大其在农村的势力？鉴于在农村各领域崭露头角的新领袖多为党员和党支部成员，该文指出，党支部作为组织仍兼具灵活性和强韧性，并预测，这种灵活性、多样性如能维持，党支部仍会在中国农村长期占有重要地位。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的根源—从“人才保障措施”角度考察】（諏访一幸）该文关注到党为保障实现其所规定的目标而执行的人才政策，描述党的统治结构，及其在维持和强化该结构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从制度论角度探讨党领导社会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諏访关注的具体问题是，1949年以后，党为其成员制定了怎样的理想形象标准，并以此吸纳新党员？党机关专任党员职员的选择和升迁制度如何？这种标准、制度为党员成分及党员管理带来了哪些变化？通过上述考察，该文揭示了共产党试图通过“人才保障措施”来保持其作为统治政党的正当性和权威，而这种努力是通过党内“法规”、“指示”、“决定”、“通知”等独特制度来实现的。基于上述探讨，諏访指出，处于党和国家核心的党加强了其内部（广义上的国家机关）凝聚力，但同时却疏远了与外部的联系，削弱了其影响，已成为“被疏远的精英政党”。

【第八章 党政分离的政治过程—中苏比较的尝试】（中居良文）较之諏访所观察到的党的凝聚力在国家机关内部得到强化，中居则进一步注意到，有观点认为，要发展经济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其手段则是党与政府的职能分离，并就此点与苏联进行比较。中居旨在探讨的具体问题是，中苏两国几乎同时提出党政分离的类似目标，但为何其后的演变如此不同？1989年曾拥有两千万党员的苏共在1991年8月实际上已经消亡，而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在1989年后仍每年递增党员150万人以上，并在2010年成为党员超过八千万人的巨大政党？这与党政分离政策是否有关？同时，通过与苏联比较研究中国共产党还有其他目的。中居对比

中苏后认为，党政分离，对戈尔巴乔夫而言仅是实现其改革（perestroyka）方案的手段之一，但却是赵紫阳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基于这种认识，中居指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面临的问题是，与1987年相比，党进行自我改革的政治环境已十分严峻，中国最高领导层甚至不得不强烈反对较为稳健的分权方案，是“与时间进行绝望竞赛的焦躁和绝望”的反映。

【第九章 现代中国的维权运动与国家】（吴茂松）该文以理解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重要语词“维权”为核心，试图对维权行为、维权运动做全景扫描，并对“维权”作严密定义。该文首先对“维权”这一语词的提出、随使用范围扩大而为市民所接受的过程及发生背景作了概观；在此基础上，该文通过探讨具体事例对维权行为的内容、焦点、特征等进行分析，指出“维权”的意义及其变化。吴的论述并无意直接针对党，但其分析所及—各阶层对权益受到侵害的抵制、对政策不满和“群体性事件”及其诉诸行政、司法等的原因与机制，以及户籍制度、利益诉求渠道、组织基础等与政治制度的因果关系无一不突出最大背景要素即中国共产党。该文清晰呈现了“维权”从媒体用语到市民用语、再到政治用语、准学术用语的过程，指出维权行为始自对侵权的抵制，集中反映了对权利乃至政治权利的要求和主张现已成为既成事实。该文还描述了曾是权利启蒙者、维权行为推动者的党和国家如何在维权运动发生过程中成为运动的对象和目标的过程，断言围绕人们拥护权利的方法、价值认识及最终目的，社会与国家是“同床异梦”。这对党的“维稳”战略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及其党员，亦即党和党员形象也是直接影响党自身实施其生存战略的重大要素。因此，我们在中国研究伙伴的帮助下，在中国各地实施多角度问卷调查。第三部分即试图依据我们所作微观调查结果，描绘党在中国社会中的实际形象。

【第十章 党在精英阶层的地位和影响——中国精英阶层意识调查（2008—2009）】（小嶋华津子）中国共产党正从工农阶级的先锋党转变为知识精英政党，其党员基础也在迅速发生变化，理解知识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和行动原理也就十分重要。该文试图就中国共产党对精英阶层的吸引力及其现状进行探讨。该文按知识精英所属政治组织及年龄段对回答者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把握知识精英党员内部价值认识的变化倾向。结果表明，围绕对社会主义及共产党统治体制，回答者整体看法存在分歧，同时，党员精英与非党员精英、不同年龄段党员之间也存在隔阂；关于共产党领导，党员的认识本身存在分歧，党员与非党员之间也有显著差距。具体而言，即使在党员中，越是年轻一代，这种倾向也越明显，他们认为入党是为获得实现自我的机会和实际利益，而非为发扬共产主义理念；党员的后备军共青团员，对党的性质——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等攸关一党统治正当性及其自我改革能力的认识，也不如党员那样肯定和乐观，其对共产党领导的绝对性表示怀疑甚至超过无党派。基于这种观察，该文指出，对于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知识精英阶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正逐渐失去吸引力，对党的领导的看法也正趋于多样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称，这种现状不仅影响中国共产党这一巨大政党的组织原理，还可能导致中国政治体制本身经新老交替而发生变化。并得出结论称，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严峻而不容失败的组织管理和运作。

那么，较之知识精英，普通党员的意识又带有怎样的特点？对此，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基于我们对上海市徐汇区居民所做的“上海市民意识调查”，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

【第十一章 从一般党员的意识、行为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上海市民调查】（南裕子）该文基于统治者的地位正当与否，不是由选举而来的程序合理性提供担保，而是依靠“民众生活中日常性支持”这一前提，试图从基层社会探究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该文应用上海市民调查数据对如下进行具体探讨，即作为组织，党是否可能督促其成员自发参与社会并从事社会服务，以向民众展示其类似公益服务团体般的性质？如果可能，其作为组织的向心

力带有怎样的特征？非党员如何看待这些党员？共产党是否在“听取民众心声”？亦即党与民众是否渐行渐远？……基于这些问题，该文分析了党员的入党动机、作为党员自我意识、党员的价值意识及其表现在行动上的固有特征，并针对党内不同年龄段和阶层的分化倾向，对其可能导致党员内部的多样性乃至党的性质演变进行了探究。该文就党的向心力论述道，现行体制获得认同如此之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尽管党员意识已经分化，但党作为组织仍具有较强向心力；此外，出于自我肯定意识，个人作为党员可以找到精英感觉，归属该组织是一种地位象征，具有品牌价值。该文得出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即党员对现行体制持有极高认同和协调，同时与非党员的分界并非泾渭分明，这标志着党作为组织具有防止自身游离于社会的较强能力。

【第十二章 基层社会与党——上海市民意识调查】(中冈 Mari) 该文分析的对象是城市基层社会党组织的渗透和统治，因此，尽管与第十一章一样应用上海调查数据，但就分析对象而言，应与第六章同属一类。该文注意到强大的组织能力是支撑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基础之一，对在城市由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转换而使党管控基层社会更加困难的情况下其应对方法是否有效进行了考察。具体而言，即基层党组织是否适应转换？党统治基层社会的能力是加强了，还是减弱了？……带着这些问题，该文从党和国家对社会统治的角度观察社区，分析了党和国家试图渗透和统治社区时遭遇到的问题、应对方式及其成效如何，且对调查所得认识一并作了探讨。该文结论认为，基层党组织认识到须应对转换，并采取了一定措施，但其方法却依靠旧有“条管单位”的指示，并不得力；至于对基层社会的统治能力，虽当下不见减弱，但如不强化“社区党员”、推进“单位党员”的“社区党员化”，则其减弱并非没有可能。

【第十三章 中国非政府组织(NGO)职员政治意识探析——基于2009年问卷调查】(阿古智子) 该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对中国非政府组织职员如何看待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共产党进行分析。一般而言，积极从事公益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职员富有批判精神。那么，事实是否如此？此次调查对象既有党员，也有非党员，所属组织及其人员、经费规模、登记形态各不相同。因此，该文首先整理调查表填写内容，以观察其是否反映回答者的不同组织背景等；如果有所反映，则意味着什么……。为解答这些问题，该文从回答者的收入状况、政治身份(党员、共青团员、无党派、民主党派)、所属组织的经费规模、登记形态等角度进行交叉分析。该文认为，尽管分析结果隐约可见“迷茫”或对政治的消极态度，但仍如实反映了非政府组织职员特有的批判精神，指出他们对政治体制并无热情，较之精英阶层，他们对社会主义及共产党的批判更强烈，且愿以更坦率态度直面现实。有鉴于此，作者提请读者注意，这些活跃于非政府组织领域的人们作为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将为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七、生存战略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社会各领域处于怎样状况，面临怎样课题，在应对这些课题的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生存战略？对于这些问题，如果读者通过上述各文分析有所了解，并对探讨中国政治孕育的各种可能性有所帮助，则本书目的已实现其半。而若能促使读者进一步关注已无法仅凭好恶来议论的中国，则实属欣喜之至。

不过，对正在变化而矛盾逐渐激化的中国，外界关注的大都是中国将会怎样？走向如何？就此点而言，本书所收各文重在依据客观事实以中立笔触描述现状，而并未对中国政治走向作统一展望，难免给读者以自我克制的印象。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我们自认不是占卜算卦、不应妄作预言；此外，如上所述，我们的中南海研究会项目本身尚未完结，第二期刚刚

起步。我们希望在本项目彻底结束后，再对中国共产党将来的演变和走向作较为恰当的展望和预测。

在兼作序言的本章结束之前，仅就本书的主课题即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战略本身的走向，略述当下研究所得印象如下：

首先，预测中国政治社会体系将在不久的将来因党失去管控能力而陷入“崩溃、混乱”之说，大可排除。因为，通过本书所强调的“预防性生存战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管控至今已著成效，而在党和社会之间发挥强有力“凝结”功能、使现行体制得到巩固的，是所有党员欲避免社会秩序混乱、崩溃的共同危机意识。

但是，上述看法存在不可忽视的根本缺陷，那就是，所谓生存战略仅是过渡时期的战略。中国现阶段为追赶发达国家所实施的、旨在加强和延续党国体制的过渡性战略，在中国赶上、超过发达国家之后将失去其效用。因为，单纯以危机管理为目的的应对措施将难以满足需要，社会将要求明确设定和提出新的目标，并以此号召全社会。所以，现在的过渡性生存战略能否孕育出这种可能性就十分重要。其答案可能来自经济领域。换言之，中国必须努力确立市场规则，并使其彻底发挥监督功能，等等。生存战略的最大意义正在于改变和摆脱如下神话：全知全能的党居高临下地观察和判断所有社会事态变化，并管控所有过程。换言之，生存战略此前取得成效的方式，是通过部分利用市场力量获得经济增长成果，再将既得利益阶层纳入体制之内。但时至今日，所有方面的制度均由党来设计、运用并监督执行已不再可能，党不得不面对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抵制。如此看来，中国能否成功转换经济模式，是判断生存战略走向的风向标。

参考文献

1. 加茂具树著《現代中国政治と人民代表大会》，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
2. 諏访一幸：《中国共産党の幹部管理政策——『党政幹部』と非共産党組織》，亚洲政治学会编《アジア研究》，第50卷第2号，2004年。
3. 諏访一幸：《胡錦濤時代の幹部管理制度——『人材』概念の導入から見た共産党指導体制の変容可能性》，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際政治》，第145号，2006年。
4. 唐亮著《変容する中国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5. 菱田雅晴：《中国共産党——危機の深刻化か、基盤の再鑄造か？》，园田茂任等编《キーワードで読み解く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近刊。
6. 菱田雅晴：《不安定下の安定——中国共産党九十周年の現況》，《東亜》，2012年1月号。
7. 菱田雅晴著《中国——基層からのガバナンス》，法政大学出版局，2010年。
8. 菱田雅晴：《中国：“全球化”の寵児？》，铃木佑司等编《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グローバル・ガバナンス》，法政大学出版局，2009年。
9. 菱田雅晴：《中国共産党のメタモルフォシオ》，寺岛实郎等编《大中華圏の実像——連携のための模索》，岩波书店，2004年。
10. 菱田雅晴、园田茂人著《經濟発展と社会変動》〈シリーズ現代中国經濟、第8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年。
11. 毛里和子著《新版 現代中国政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
12. 若林正文著《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國台湾化の戦後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
13. 景跃进：《転型・吸収・浸透——党の組織技術の変遷と課題》，本书，第4章。
14. Brodsgaard, Kjeld Erik & Yongnian, Zheng eds. [2003]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5. Brodsgaard, Kjeld Erik & Yongnian, Zheng eds. [2004] *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 How China is Governed*.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6. Chang, Gordon G. [2001]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Random House.
17. Diamond, Larry Jay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 Toward Consolid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8. Dickson, Bruce J. [2003]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Modern China Serie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 Dickson, Bruce J. [2008] *Wealth into Power :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 Gilley, Bruce [2005]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1. Gore, Lance L.P. [201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a's Capitalist Revolution :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market*. Routledge.
22. Hishida, Masaharu [2009] "The morphogenesis of the CPC : Organizational issues" . In *China's Trade Unions-How Autonomous Are They? ; A Survey of 1811 Enterprise Union Chairpersons.*, Hishida, M. et al. Routledge 2009. 12.
23. Hu, Shaohua. [2000]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Praeger.
24. Inglehart, Ronald (co-authored with Christian Welzel) [2005]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 Landry, Pierre F. [2008]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60] *Political Man :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李普塞特 (Lipset Seymour Martin) 著 《政治のなかの人間——ポリティカル・マン》, 东京创元新社, 1963 年)。
27. McGregor, Richard [2011] *The Party :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Penguin. (日译本 : 小古 masa 代译 《中国共产党 支配者たちの秘密の世界》, 草思社, 2011 年)。
28. Osinga, Frans P. [2006] *Science Strategy and War : The Strategic Theory of John Boyd*, Abingdon. UK : Routledge.
29. Pei, Minxin [1998] "Is China Democratizing?" *Foreign Affairs* 77 : 68-83.
30. Pei, Minxin [2006]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1.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10] *22-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Pew Research Center.
32. Rowen, Henry S. [1996] "The Short March :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Nixon Center.
33. Senge, Peter M. [1994] *The Fifth Discipline : The Art &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Doubleday Business ; 1st edition. (日译本 : 守部信之译 《最強組織の法則——新時代のチームワークとは何か》, 徳间书店, 1995 年。中译本 : 郭进隆译 《第五项修炼》,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
34. Shambaugh, David L.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 :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C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35. 冯仕政：《红果社会转型期的阶级认同与社会稳定—基于中国总合调查的实证研究》，《社会学》，2011年第9期，第72-78页（原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27-133页）。
36. 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中国社会稳定网，西南政法大学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2010年10月9日（原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37.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
38. 民政部《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制度》，1993年12月。